

历史的缝隙处

张冠生
采写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历史的缝隙处

张冠生 采写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缝隙处 / 张冠生采写.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207-0724-4

I. ①历… II. ①张… III. ①改革开放—成就—中国 IV. ①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93186 号

历史的缝隙处

(LISHI DE FENGXI CHU)

采 写: 张冠生

策 划: 陈 卓

责任编辑: 张永俊

责任审校: 凌 寒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 113 号

邮 编: 100007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2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207-0724-4

定 价: 48.00 元

发行电话: (010)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请拨打电话: (010) 85924602 85924603

自序

这本书中的口述文字，始于 2000 年春，止于 2018 年秋。

有这些史料的积累，该感谢费孝通先生。没有先生提示、鼓励，当无此书。

初见费先生，是 1987 年深秋，随他到湖南参加“长江荆江段和洞庭湖地区综合治理学术研讨会”，做实地调查。

行程中，费先生带着他的一本书稿，《山水·人物》。其中一篇“少作”，题为《年终》。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荆棘蔓蔓的人生道上，随处都给你看见许多值得留意的事情，同时启示你了宇宙人生的意义。我这愚蠢的笔，固不能在道上随处记出一些给后面很努力赶来的同类们作一些参考，但是我却又不愿这许多值得留意的东西，在未经人注意的时候，随着无名无声的浪花流星般的熄灭。我自己认为这是我唯一的责任。”

费先生写这篇文章时，刚满十七周岁。

读着这段文字，内心略感震撼。这位老先生著述等身，初衷在此，

一生未辍。

以后多年里，为费先生当助手，做书童，每读其文其书，总想起这段话。朴素，深刻，易行，有感召力。

有朋友也留意到这段话，由此延伸到费先生许多“值得留意”的话。晓群兄、祥林兄发愿，要留下“世纪老人的话”，嘱我为费先生做口述。时值 1996 年。

很巧，同年，“费孝通教授学术活动六十年欢聚会”后，费先生嘱咐做点口述历史的题目——“记录身边历史，口述是个好办法。大时代里故事多，多做点笔记，会觉得有意思。这个世纪快过去了，动荡得厉害，赶快留点东西下来。”

此事正合节拍，且可从先生本人开始，起步相对容易。此后数年，世纪交替之际，先后完成《世纪老人的话·费孝通卷》和《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

为沈先生做口述，也是费先生所嘱。

大体同时，大洋彼岸，为二十世纪“立此存照”是国家行为。

1998 年 2 月 11 日，美国首次千年晚会在白宫举行，表示要“为一个世纪的终结和一个新千年的诞生留下印记”——“从今年开始一直到 2001 年，白宫将领导一个全国性的千年庆祝计划，让美国人民鉴赏我们共有的传统”。

该计划中有项活动，命名为“我的历史就是美国历史”，配“指南”手册。

中小學生普遍参与其中，就近访问他们的父母、祖辈、曾祖辈和其他亲友，听他们讲南北战争、西部拓荒，讲“一战”“二战”“越战”“冷战”，讲大萧条、罗斯福新政、股市、赌场……

万千录音机、笔记本，海量见闻。阁楼、地库里的地契、勋章、军衔、税票、书信、日记、证照，变脆的报纸、裂纹的唱片、生锈的

农具……

历史就在眼前。个人，家庭，家族，国家，浑然一体。

当时正受朋友委托，参与《东方》杂志编辑事务，主持“现象”板块。受此启发，新设栏目，名为“我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

“我”，可以是名流，如院士、政要，也可以是普通人，如村干部、教师。

向朋友约稿，自己也尝试着写。没有计划，没有既定目标，只是随缘，顺其自然。

多年的朋友，偶遇的陌生人，做调查接触的农民，修皮鞋结识的工匠，当记者采访的港商，去看病碰上的中医，朋友推荐的律师……乐意说说的，我就听，就记，就写。

静心听听他们的阅历、体验，个个有故事。故事中的社会变迁，无须刻意关注，时常都可感受，家国确实难分。如实记录，汇聚于此，是想说：其中确实有些“值得留意的东西”，或能启示“宇宙人生的意义”。借文字记录下来，无非是希望不至于“随着无名无声的浪花流星般的熄灭”。

书中这些人，多数很普通。因为普通，一般历史叙述容易忽略他们，成了“沉默的大多数”。这些口述文字，有意请他们回来，听他们发声。

有“历史癖”的胡适先生，推重平民历史，鼓动普通人写回忆录。其族叔胡寄凡，写有《上海小志》一书，请他作序。胡先生借序言发感慨说——

“‘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这两句话真是中国史学的大仇敌。”自以为贤者的史家，专写朝代兴亡、君主立废、战争经年，而忽略平民日常生活，“故一部《二十四史》的绝大部分只是废话而已”。

各地方志也“往往有的是不正确的舆图，模糊的建置沿革，官样文章的田赋户口，连篇累牍的名宦列女。然而一地方的生活状态，经济来源，民族迁徙，方音异态，风俗演变，教育状况，这些问题都不在寻常修志局的范围之内，……故汗牛充栋的省府县志都不能供给我们一些真正可信的文化史料”。

平和到家的胡适先生，如此激烈地批评经典史书和官修方志，可见他对帝王将相、宏大叙事的轻蔑，也能知道他对平民历史的看重。

在他眼里，《史记》里的偶然一句“奴婢与牛马同栏”，比楚汉战争胜负重要得多。女人穿的鞋子“关系无数人民的生活状态，关系整个时代的文明性质”，是“刮刮叫的大事”。

胡先生说，如果有工夫写自传，他会用很大一章写自己家乡的社会背景，包括百姓生活。他曾从美国专门写信，询问辛亥革命以后家乡的种种具体变化。

胡先生赞赏“识其小”，看重平民历史，倡导小人物注意留史料，有深意，值得记取。同时，他也鼓励口述历史，帮助唐德刚做了十六次录音，完成了非凡的《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先生亲笔拟写口述自传大纲，是1957年。六十余年后，这本《历史的缝隙处》，是费先生嘱咐之下的一份作业，也是对胡适先生推重平民史观、鼓励口述方法的个人响应。

费先生一生抱有强烈的民本观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他面对西方世界讲述中国，说的就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不妨说，《江村经济》就是费先生代言的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的开篇。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他写信给胡适先生，切磋史实，称胡先生为“老师”，非敷衍之词，应是“求其友声”。

推重平民的历史角色，费先生胡先生是同调。著述在，读得出。

“谨将此书献给费孝通先生”——是真实心情。印在扉页，恐蹈胡适先生“稍嫌渲染”之讥。写在这里，以标此书来路。

2018年10月26日晨

于博雅西园

目 录

伍淑清：中国“001”号合资企业（上）	001
伍威全：中国“001”号合资企业（下）	009
沈继光：带着近乎神职人员的责任	015
龙安志（上）：中国不能这样“文化切腕”	033
龙安志（下）：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051
景 爱：中国沙漠考古第一人	063
高增德：抢救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遗产	081
陈利军：中国股市里的跌宕人生	115
侯艺兵（上）：从邓稼先逝世、杨振宁掉泪开始	137
侯艺兵（下）：我在小岗拍的第一张照片	163
严俊昌：救小岗村人的命，只有分田这条路	189
姚敬堂：朱仙镇木版画的接班人还不知道在哪儿	217
张廷旭：要是我不干了，这画儿就快灭绝了	225
崔玉衡：就凭中医能治病救人这一条，也得坚持	233
位梦华：从南极到北极	247

祝师傅：人总要一代比一代强点	271
柏均和：袁世凯的一些家事	281
陈 军：拨打了一整天电话才接通，只为说一句话	295
沈宏邦：我想让尽量多的孩子接受好的教育	317
黄镇国：我为寡妇写了一辈子信	335
李青林：这辈子要活个心里踏实	347
后记	361

口述：伍淑清

时间：2000年4月20日

地点：北京京城大厦

伍淑清女士接受采访的现场格局和气氛别具一格。

她自觉承担的社会责任太重，需要处理的事务太多，需要在一个较宽敞的公共空间同时安排几个谈话区，在几个区域间穿梭往还，用不同的语言，接待不同的谈话对象，讨论不同的话题。

同时，会时常和旁边走过的熟人打招呼。普通话、广东话、英语，自如转换。语速很快，词锋锐利，又带着厚重的涵养。

即使谈着中国改革、世界格局之类的大话题，她也不会忽略客人面前的咖啡续杯、茶杯添水这等细节。

家族熏陶，自身修为，合成伍淑清。既淑，且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决定改革开放。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我到内地访问。

1978年12月23日，我第一次到内地。那个时候，要先从香港坐火车到罗湖，到罗湖后，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从广州坐飞机到成都，用了一整天时间。我们是上午九点出发，辗转几个地方，晚上九点才到成都。

从那一天的切身经历中，我体会到了内地交通条件需要改善。

在去往广州的火车上，我从广播里听到了邓小平的声音，我记得很清楚，他说：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欢迎外商到中国投资。当时，我是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的十六位理事之一，希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点事情。



伍淑清说起的“内地访问”，是应当时代行政职能的新华社香港分社之邀约。本为邀约伍淑清的父亲伍沾德，因伍老先生当年5月刚刚到过内地，所以有了伍淑清初访内地的机会。

我想，中国打开国门之后，会吸引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到中国投资，航空服务业应该首先发展起来。我的父亲是做食品行业的，也许可以考虑把做食品的经验和中国航空服务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和改善内地交通条件结合起来。

1979年，我带队到内地做具体考察，碰到了一个机会。当时，李先念出访菲律宾，我的父母就带了厨师、厨具，一路为李先念做饭。为国家的领导人做饭配餐，证明我们可以在食品制作方面达到比较高的水准。

从菲律宾回来，我们就开始和中国民航总局谈做航空食品的可能。在1979年6月份，一共谈了三次。到了9月，又接着谈。那时，中国刚刚表示要开放，合资企业还没有先例，前途未知，外商心里不是十分

有底，觉得跟共产党谈生意风险很大，担心以后被吃掉。这种心理很普遍。

我们分析，从大势上看，中国要发展生产力，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要改革开放，中国民航就要飞国际航班，国际航班上就要有合格的食物，让中国飞机上的餐饮率先走向世界，使它成为打开国门的第一个窗口。食品虽小，意义却不小，所以我们还是有信心的，要接着谈。当时民航局的沈图局长等人和我父亲进行了一年多的协商、谈判。



此事缘起，和习仲勋有关。1979年，我国一个代表团出访，路过香港。团长习仲勋表示要见伍沾德先生。见面时，习仲勋说：伍先生，我在广州工作，您到广州来看看，做点生意嘛。伍先生表达了相同的心愿。这才有这次一年多的协商、谈判。

在这个过程中，沈图把准备和香港一家食品公司合资搞航空食品的事情汇报给了邓小平先生。邓先生就说：你要了解一下，你的合作伙伴懂不懂得做面包，做出来的面包掉不掉渣。不懂得做面包，做的面包掉渣，就不要谈了。我觉得，邓小平先生考虑问题非常务实，非常实事求是。对这样的领导人直接关心的事情，我们是有信心的，所以就接着谈这个事情。有一次，从白天晚上十点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六点，终于把这个项目谈了下来。

当时有四个机构同时和国家民航局谈这个项目，有新加坡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还有北欧的FAS，我们以港澳同胞的身份参与谈判，最终争取到了合作机会。

当时刚刚开始开放，公司章程、企业法律等，都还是空白。我们为配合国家开放，就把香港所有的公司章程、公司登记办法收集过来，从英文译成中文，拿到内地，参考使用。

内地对我们的审核相当严格。不光要“懂得做面包”，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符合要求。1980年3月，沈图局长向邓小平报告，已经调查过伍沾德的背景了，政治上没有问题，也没有经济问题。于是邓小平指示：这个事情赶紧办。

又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就有了中国的“001号”合资企业。

1980年5月1日，我们和中国民航合资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据说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5月3日，当时是中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先生为我们开业剪了彩。这个公司的成立和运行，结束了中国民航没有航空配餐企业的历史。

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要为国家做出国际水平的航空食品，我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公司发展到今天，已经在为近五十家中外航空公司提供配餐。其中有近三十家外国航空公司，比如汉莎、美西北、美联合、全日空、加航、英航、日航等，近二十家国内航空公司，如国航、东方、南方、新华、西北等，为它们提供机上配餐业务，日配餐量最高接近三万份，最低接近两万份。公司还为中外政要人物专机和包机配餐，曾经为日本天皇、英国首相、美国总统配餐，这都要拿出国际一流水平。

因为公司的服务质量高，我们得到过美国优质服务科学协会颁发的五星钻石奖、英航颁发的优质服务奖和优秀配餐间奖、美联航颁发的质量保证银奖、北欧航空公司颁发的环境保护奖，等等。

 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一个非凡的过程，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时间双方探索合资企业开办与经营方式的创举。伍沾德和伍淑清作为合资方筹措够应承担的五百万港币之后，内地方面还没有相应规范，没有向他们提供合同、章程、委托书等通例文件，只是“握握手就一言为定了”。后来还碰到过美国设备禁运等难题，只能一一设法解决。

我的父亲一直在做食品。在他三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就去世了。后来，我的祖母把我的爸爸和伯父从美国带回家乡广东台山。爸爸从1956年开始和我的伯父一起搞食品，做餐厅，从零开始。到1979年，已经搞了二十三年，在香港发展成为一个有一万三千员工三百多个店的美心食品集团公司。他一直告诉我，做事要靠自己。父亲对我一生的事业有很大影响，我在八岁的时候就想定了，一早就给自己定了位，就是做餐厅，搞食品。我们就是带着二十三年做食品的经验 and 做事情的想法来内地办食品企业的。

从注册“001号”企业到现在，又是二十年了。二十年里，我们像邓小平先生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交了不少学费，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二十年来，我们经历了“001号”合资企业的发展过程，也看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

企业有了发展以后，应该为社会再多做点事情，我们可以做什么呢？1997年4月，我在飞机上碰到董建华先生。那是香港回归之前。董先生问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告诉他，正安排宋庆龄基金会的人，利用复活节的时间到北京看看，还要到内蒙古的赤峰去。董先生谈到，他正在考虑，香港将来回归以后，他作为特首，要用很多精力来做人心的回归工作，尤其是要让下一代从内心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有对“国家”这样一个概念的基本理解，有对中华民族的感情。

我觉得他这样考虑问题是对的。在香港传媒中有不少负面的报道，说内地很落后，共产党很可怕。这使香港的孩子对很多问题都不了解。有很多孩子只觉得自己是香港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甚至不愿意做中国人。这对回归后香港的稳定和持续繁荣是不利的。我们在飞机上就商量起来。香港有五百家中学校，要是每所中学一年能送二十个学生到内地来，香港就可以每年有一万个学生来内地，五年就可以有五万个学生来观光、学习，增进对内地建设成就的了解，增强民族感情。这五万个

学生，又会对五万个香港的家庭产生好的影响，这对稳定香港社会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个事情怎么做起来呢？回香港后，我就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曾经用宋庆龄基金会的名义做过类似的事情，但是不太方便。用香港的牌子做，也不可能做得很开阔。我很希望吸收香港在海外读书的、移民的或者回流的人士，都来参加这个活动，所以就动议创办了中华青少年历史文化教育基金组织。我邀请董建华先生来做这个基金组织的名誉赞助人，他答应了。实际上，这个基金组织是要为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做事情，培养下一代，懂得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们是以民间组织的面貌出现，香港特区政府没有给我们钱，一切都从零开始。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就联合香港其他的社会组织一起来做。

 伍淑清发动和组织的这类活动，想法朴素，标准很高，既有宏观思考和布局，也有具体指导和要求。这和她的成长过程有关。她在香港完成中学学业后，赴美攻读工商管理专业，两年半完成了四年的课程，全部功课成绩为“A”，被评为“杰出学生”，获得很高荣誉。毕业后，她有意在基层工作中磨炼自己，曾在父亲参展的日本世博会做服务员，学习为人做事之道。日本服务业“顾客至上”的极致标准，给她以深刻的触动和后续影响。后来的人生和事业，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高标准。

我们现在每年安排一千个学生来内地，加上别的团体的安排，每年大约有一万个学生到内地来，基本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我们组织的名称是“中华”，将来还可以吸收台湾的孩子来大陆，来看看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我们没有强调更多的政治色彩，而是强调认识具体的历史文

化。比如最近一次，我们组织了二百三十多个学生来内地，其中有六十多个学生的爸爸妈妈也来了。

我们这个团的名称是“中华历史文化教育团”，带来了宋庆龄少年合唱团的节目，要在人民大会堂演出。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陪着自己的小宝贝来，也就慢慢能和内地的同胞接触、交流，对他们了解内地的真实情况会有益处。他们的孩子来内地，他们为每个孩子拿出两千五百块钱买往返的机票。每个孩子在内地五天需要花费的三千块钱由我们赞助。

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和家长成了合作伙伴，这样对做事有利。在香港，你完全免费给他，他会觉得没有价值。完全要他付钱，他会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走？我可以自己去的。我们给他出一半多一点的钱，他节省了费用，又能到内地来，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从直接的效果看，是带着下一代来“寻根”，来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懂得自己的身份。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可以为特区政府培养一批人，将来他们会有一种责任感，来了解中央政府的要求，解决怎么搞好香港的问题。香港的持续繁荣稳定，最终是要靠“一国两制”的建设性成果来保证的。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为国家分忧，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话，大家都熟悉，可是怎么服务呢？容易谈，却不容易做。总书记、总理都在为人民服务。他们管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确实很不容易。要改革开放，要拿出办法。办法好不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觉得胡耀邦先生当时强调的这句话很对，很有用。

胡耀邦先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坚持说出来这句话，很不容易。这是他在当时所能做的最好的为人民服务的事情，对一个民族的思想解放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很赞赏他。虽然后来他又有些曲折，心情不是很好，但是英文里有句话，Time will tell，时间会告诉你，他是一心为人民的人，他是对的。